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

■ 刘世军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形成一系列重大理论判断和重要制度安排,打开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视野,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走向,写出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宣言和行动纲领,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理解中国治理文明与治理现代化之路,要有古今中西的“双重视野”

治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也与人类社会同样现代,治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之主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尺度。新时代的“双重视野”,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毫无疑问,解读“中国之治”是破解“中国之谜”的一把钥匙。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人类社会治理文明的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这条治理新路以制度体系建设为基础,以治理能力建设为根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绩效有机统一,坚持继承本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和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产物。理解中国治理文明与治理现代化之路,要有古今中西的“双重视野”,从中华文明5000年、中国国家治理文明3000年、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长时段来观察。自秦置郡立县、一统六国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在治乱兴衰的周期律中缓慢发展,尽管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上各有不同,但基本治理结构殊途同归,从未中断,正所谓“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毫无疑问,认识今天的中国治理文明,要立足中华文明的传统,特别是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在国家治理上形成的独特经验和智慧,比如大一统与多样性、家国一体、德法并治、察举科举、选贤任能、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等。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主权和治权沦丧,民生凋敝,战乱频仍,正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倒幕到了极点,但中华民族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奋起反抗,经过几代人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接续奋斗,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发生历史性变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把这条新路放在中西视野下认识,就是中西政治文明的对话,这个真正的对话是从近代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近代人民主权、代议制、分权制衡、法治传统、政党政治等西方国家的治理文明体系,从社会主义500年的理论构想,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经验得失,都成为中国人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参照,与近代17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探索是密切交叉的,对话互鉴的。认识和研究今日中国之国家治理,有了这两个视野,就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的必然逻辑。

中国的国家治理完成了“双重超越”,形成了具有显著优势的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践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国家治理完成了“双重超越”,形成了具有显著优势的治理体系。一个是超越了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传统中国是皇权治理体系,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乡村自治,社会的组织性很弱,像一袋散装的马铃薯。所以,到了近代,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治理体系很快土崩瓦解,看上去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实际上是原子化的分散体,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毫无招架之力。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化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实现了对传统治理体系的革命性超越。另一个是超越西方治理窠臼。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制度和治理模式在中国粉墨登场,但都以失败告终。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0年前,柏林墙倒塌后,美国政治学者福山作出“历史终结”的预言,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西方国家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但实际上“黄金时代”不仅没

有到来,相反迎来的是战乱冲突、社会动荡、经济衰退、难民危机、民主破产等乱局。与此同时,出现了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和“中国之治”奇迹,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成功实现自我和西方的“双重超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正是这种“双重超越”,实现了国家治理的“两个转化”,一个是传统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个是外来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由此而成就的发展“奇迹”和治理“奇迹”,成为21世纪国家治理文明的典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党的领导体系、人民当家作主体系、依法治国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为框架,以经济、文化、城乡、社会、生态、军队、特别行政区、外事等治理体系为支撑,绘制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路,需要正确处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党与人民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创造超强政党、超大国家、超大社会、超长历史、超大人口、超速发展、超常稳定的治理景观,把改革发展稳定的逻辑贯穿于中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过程各领域。

揭示初心转换为力量的密码

读《铁心力量》有感

■ 曾峻

初心,原本是佛教经典中的词汇,后来人们多从文学、哲学角度加以阐释,以表明最初理想、志向的可贵及其对于人生导航的激励功能,因此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警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外部和自身的种种因素却往往导致初心容易被遗忘,偏离乃至背离初心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又有“初心易得,始终难守”的感慨。一个人如此,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也是如此。1919年,孙中山在《行易知难》中对他所领导的革命活动进行反思:“溯夫吾党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烈,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这一论述可能是把初心与政党联系起来的 earliest 文字。很可惜,孙中山总结的教训并未被认真吸取,于是国民党难免走向破裂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有特定的内涵,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了初心之于我们党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赋予初心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时代要求。就前一方面而言,体现为把“初心”与“使命”并提。使命不是一般的任务,而是值得终生追求乃至为之付出生命的任务,同时使命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也具有特定的指向。这样,“初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静态的概念,而成为一个具体的、动态的过程,坚守初心便有了现实着力点。就后一方面而言,当下我们讲初心和使命,目的在于完成新时代各项战略任务,通过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更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好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这个过程中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铁心力量》抓住了党的初心和使命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特别指出要坚守初心、履行使命必须有铁一般的信仰和信念。这或许是本书把“初心”视为“铁心”的主要原因。在《铁心力量》之前,朱亮高同志还先后主持编写了《打铁还需自身硬——今天如何做一名共产党员》《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努力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两本书。这三本书可谓“三部曲”相互呼应,贯穿始终的是建设新时代“铁军”这个重大政治命题,是打造钢铁般坚强的党员队伍这个现实关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初心只有转化为行动,才能汇聚成九千多万党员再写新传奇、再创新辉煌的磅礴力量。初心何以化为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方案界定为四个环节: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这12个字是主题教育的总要求,也构成《铁心力量》篇章安排的基本依据,揭示出了把初心落到实处的内在逻辑和外化指向。守初心是源头活水,包含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立场,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担使命是神圣要务,体现的是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就是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找差距是基本途径,就是要自觉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党员提出的新要求对标对表,发现“短板”“弱项”和不足。抓落实是根本追求,就是要在精气神、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等方面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初心使命的实在伟力。正如作者所言,初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那么,初心就会成为“宏大而具象的、政治而幸福的、光辉而崇高的、历史而未来”的力量。

在阐释初心力量过程中,作者善于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展示立意的高度、知识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同时,注意用精练的概括、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深奥的道理,体现出理论应有的温度。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提升协商民主效能 充分发挥独特优势

■ 于洪生

协商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简称。从民主协商发生的场域来讲,政治协商主要是在国家宏观政治层面展开;从协商发生的议题来讲,政治协商主要围绕国体、政体等根本性政治议题,以及党和国家、党和政府、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党和人民、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等涉及国家基本权力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等议题而展开。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全国人大一起发挥作用,将政协体现的协商民主和人大体现的选举民主很好地结合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实性、广泛性和有效性。

政策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第二个构成部分。政策协商,是党和政府追求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的重要成就。相较于政治协商,政策协商定位在党和政府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层面,围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公共政策决策,展开民主参与和民主协商。这种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决定》中明确指出,“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社会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第三个构成部分。社会协商民主是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体而言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变革中开始,并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推进。社会协商主要在微观层面上运行,议题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相关的各种事务,强调的是公民的直接参与、理性对话、审慎思考、规范行为。社会协商民主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为载体,以制度化手段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调解矛盾的桥梁。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有效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协商,包括城市社区自治中的社会协商、村民自治中的社会协商、单位和社会组织中社会协商等,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进而打牢“中国之治”的社会根基。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金融开放也是一场改革

■ 徐璋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下一步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决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然要求。

金融进一步开放是大势所趋

金融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金融进一步开放是顺应我国进入新时代、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过去几十年开放发展,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主;随着我国开放经济进一步深入,服务业开放将逐渐成为开放经济的主要方向,将引领我国开放经济逐渐走向高水平发展新阶段。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增强金融的竞争力与活力,才能进一步增强金融的有效供给,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稳信心。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要求高水平开放经济支撑。以金融、教育、医疗等为代表的服务经济核心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将成为我国发展高水平开放经济的重要标志。过去几十年开放发展,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主;随着我国开放经济进一步深入,服务业开放将逐渐成为开放经济的主要方向,将引领我国开放经济逐渐走向高水平发展新阶段。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增强金融的竞争力与活力,才能进一步增强金融的有效供给,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稳信心。

推动金融开放也是金融业自身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可以使实体经济从国内外市场聚集更多的资本,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又能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最终提高金融的效率性、可获得性。同时,在开放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借鉴成熟经济体的制度建设经验,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监管和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完善。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和全球金融监管体制,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治理机制运行,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和话语权都由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主导和掌控,在国际金融治理规则制定、关键问题决策、重要岗位

人选推荐和任命等方面,我国的参与度与我国现有综合国力极不相称。只有金融进一步开放,才能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内的话语权和金融治理规则制定权。

需具备开放发展的基本条件

金融开放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一般而言,金融开放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相关,具体包括资本项目的开放、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和汇率政策形成机制;另一个层面是和金融服务业相关,包括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机构开放等。推动我国金融开放,既涉及高水平开放问题,更涉及金融体制机制改革问题。

我国金融开放需要具备开放发展的基本条件。从开放现实路径来说,从资本账户相关领域推进开放,就必然要有序、稳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国际化;从金融服务业稳健推进开放,关键在于国内监管体制是否健全,国内金融机构是否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从历史经验来看,两者的开放没有先后,是根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也可以同时推进。

我国金融稳步有序开放需要完善审慎监管,推进国内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金融开放,以开放促竞争,以开放强实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性水平也不断提高,只有更有竞争优势的金融制度和运行机制才能吸引和聚集更多的全要素资源,进而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更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开放程度要和监管能力相匹配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开放需

在严格监管框架下进行,高水平的金融开放需要高水平的金融监管。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对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外溢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更易于形成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因此,在不断扩大开放同时,要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风险,不断地提升金融监管能力,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金融开放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有效的金融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当下,在推进我国金融开放与改革过程中,要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逐步建立和完善与金融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特别是要防范金融开放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跨境资本无序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冲击,为金融开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防范金融风险要对潜在风险因素设置有效防范与应对机制,设计好金融开放的路径和审慎监管的框架。要持续完善审慎监管体制,把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重点在于宏观审慎监管及跨行业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相关制度。金融机构要做到稳健合规经营,一方面需配合宏观审慎监管、监管机构协调,防止风险跨行业传染;另一方面,需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内部制衡机制的运行,明确政府部门、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管理边界,及时有效的控制风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7月20日,国务院发布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政策措施。10月11日,中国证监会明确了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时点。此外,《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在制定……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步伐正越走越稳,也越来越快。未来,中国的金融开放和发展不仅会进一步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必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